

目击

MUJI

TAIHAIFENGYUN

台海风云

II

●李立 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目击 MUJI  
TAIHAIFENGYUN

# 台海风云

II

●李立 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目击台海风云. 2 / 李立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12.5  
ISBN 978 - 7 - 80252 - 367 - 8

I. ①目… II. ①李… III. ①台湾问题—史料 IV. ①D6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087083 号

## 目击台海风云. 2

---

作 者: 李 立

责任编辑: 鲍立衍 张希明

装帧设计: 王 烨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电 话: 010 - 82885151

邮 编: 100083

电子信箱: huayip@vip.sina.com

网 站: www.huayicbs.com

印 刷: 北京顺义兴华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2 - 367 - 8

定 价: 32.00 元

---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 Contents

### PART 1

#### “二·二八事件”真相揭秘

腐败统治在台重演 /2

“二·二八事件”爆发 /6

血腥镇压悲剧 /10

难以抚平的历史伤痕 /12

15

### PART 2

#### 蒋介石逃台前后

蒋介石首次台湾行 /16

蒋介石为何选择台湾? /17

国民党撤台乱象 /20

1949：蒋介石“最悲惨的一年” /22

南京，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24

华盛顿，美国人“等待尘埃落定” /37

台湾岛，蒋介石的最后藏身之地 /44

集兵保台 /48

蒋介石第三次“复职”视事 /60

国民党的改造 /68

改造后的国民党 /73

打垮老对手 /80

“保密防谍” /93

不可放过一人 /100

111

PART 3

蒋介石“反攻复国”

“三民主义光复大陆” /112

一、二、三、五计划 /116

究竟谁攻谁 /120

131

PART 4

台岛大事揭秘

“四六惨案”始末 /132

“五二四”反美运动 /148

“吴国楨事件” /149

“《自由中国》事件” /151

“湖口兵变疑案” /153

陈诚为何被“踢出官场”？ /154

“《文星》杂志事件” /158

161

PART 5

鲜为人知的华人精英“保钓”运动

“保钓运动”的由来 /162

寻找“保钓”精英 /164

激情燃烧的岁月 /165

两次大游行未能奏效 /167

华裔学者的身影 /168

周恩来总理接见“保钓”人士 /170

回国效力 /175

务实报国的实践 /177

“被遗忘的奉献者” /178

“保钓运动”的伟大意义 /180

尚未完成的事业 /183

## 187 PART 6 解决台湾问题的几次有利时机

- 杨杰献“奇谋”，可惜未采纳 /188
- 毛泽东筹划解放台湾 /189
-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阻挠台湾解放 /193
- “文革”打破“和平梦” /198
- 统一未了乘鹤去 /200

## 203 PART 7 台湾反对运动兴起始末

- 蒋经国“新政” /204
- “中坜事件” /208
- 《美丽岛》风暴 /212
- 蒋经国启动“宪政改革” /216
- 最大对手民进党诞生 /222

## 225 PART 8 蒋经国开放大陆探亲前后

- “三不政策” /226
- 驾机回大陆 /231
- 去台 40 年，秘密回故乡 /235
- 台湾老兵不再沉默 /237
- 潮流所趋，民心所向 /239
- 蒋经国“向历史作交代” /242
- 回家！回家！台胞如潮水般涌向祖国大陆 /244
- 泪洒心香祭祀黄陵，两岸同为炎黄子孙 /245

## 251 PART 9 杨斯德情系两岸统一

台胞来大陆探亲政策的出台前后 /252

“来去自由” /252

两岸一家 /253

亲情隔不断 /255

.....PART 1

---

# “二·二八事件”真相揭秘

1111 台海风云2

MUJITAIHAI FENGYUN2

腐败统治在台重演◎

“二·二八事件”爆发◎

血腥镇压悲剧◎

难以抚平的历史伤痕◎



## ◎ 腐败统治在台重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回到祖国的怀抱，惨遭50年奴役的台湾同胞热情迎接来自祖国的官员和军队。然而，1947年2月28日，台湾同胞却在全岛掀起了反抗国民党腐败统治、争取民主、争取自治的武装起义。起义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血腥镇压，大概有上万台湾同胞死于非命。国民党对“二·二八事件”的残酷镇压，给台湾同胞造成了极大的心灵创伤，同时也种下了对国民党的仇恨，这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创伤和仇恨至今未能愈合，深植于台湾几代人的心灵之中。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台湾同胞每时每刻都盼望回到祖国的怀抱。由于两岸长期隔离，台湾同胞对祖国的情况很不了解，尤其对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没有清楚认识，因而对国民党的接收人员给予了英雄式欢迎。1945年10月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警备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率80余人飞抵台湾，受到台湾人民的热烈欢迎。10月17日，国民党部队在基隆登陆，受到来自各地久候的民众欢迎。登陆部队进入台北后，30万市民夹道欢迎，并高唱《欢迎国军歌》：台湾今日庆升平，仰见青天白日清；哈哈，到处欢迎，哈哈，到处歌声；六百万人同快乐，箪食壶浆表欢迎。10月25日，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市公会堂（中山堂）举行，台澎地区的受降代表由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担任，陈仪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会场外的广场，被前来争睹盛况的民众挤得水泄不通。为了欢庆回归祖国，台北市社会各界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游行，全省上下到处张灯结彩。这种热闹感人的场面，足以用“如醉如狂”来形容。然而，没过多久，这种回归祖国的狂喜却被失望、仇恨所取代。原来国民党根本就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孙中山的继承人”、“抗日英雄”，而是一个极尽贪污腐败之能事的官僚集团。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对台湾同胞的统治，在台湾设置了“台湾总督府”。总督府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大权于一身，掌握了对台湾同胞生杀予夺的大权。在台湾同胞眼中，总督府是反动、专制统治的象征。然而，国民党收复台湾之初，不设省政府反设一个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大权于一身的行政长官公署，这套制度等于是照搬了日本治台的“总督制”，使台湾同胞产生了“总督制度复活”的感觉。而国民党反动政权在接收台湾之初的种种腐败行为，更令台湾同胞极度不满。

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后，虽然名义上给台湾人民参政的机会，而实际上却以“台湾人受日本奴化教育太深，又不懂中国普通话”为借口，把许多台湾人排斥在中高级职位之外。在行政长官公署9个处的18个正副处长中，只有两位是台湾人；在高级公务员当中，台籍人士所占的比例也很小；在县市市长方面仅有3位是台籍人士（台北市长游弥坚、新竹市长刘启光、高雄县长谢东闵），且都是曾到大陆求学或工作再返回台湾的“半山”。国民党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各金融机构和大中型企业，也均由大陆人掌控。此外，许多接收大员还在机关之内大搞“牵亲引戚”的用人作风，将台湾人从职位上撤下来，由一些毫无技能的滥竽之辈补缺。如农林处检验局局长叶声钟把一位具有30年经验的台籍技正弄走，然后由自己的姨太太来补缺；高雄市工业专修学校的一位刘姓校长，竟以不识字的岳父充任教员等等。不仅如此，即使有幸保住工作者，虽然做同样的工作，工资也较大陆人低许多，而且无法享有大陆人享受的其他补助。久而久之，当然会引起被排挤在工作之外的失业者及受歧视者的内心不平。

国民党到台湾后由接收变“劫收”。从1945年10月到1947年2月，国民党共接收日本驻台机关、企业、个人的财产共110亿元旧台币，以及全省30%的房屋和20%以上的可耕地。这些企业、银行、房屋和土地，有很大一部分是日本殖民者从台湾同胞手中抢去的，本应酌情还一部分给原主，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却照单全收，台湾人无缘置喙。此外，一些接收大员到台湾专门接收金条、洋房、汽车、小妾和高位，中饱私囊，时人讥之为“五子登科”。“五子”意指：金子、房子、车子、位子、女子。对于接收大员们的“劫收”丑态，记者唐贤龙在“二·二八事件”后不久，于南京出版的《台湾事件内幕》中是这样描写的：“自从国内很多人员接管台湾后，便抢的抢、偷的偷、卖的卖、转移的转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国内劫收的那一套戏码统统都搬到了台湾。”吴浊流在小说《波茨坦科长》中，男主人公范汉智

向他的新婚台湾妻子说：“台湾真是好地方，从重庆只穿一套西装过来，不久就可以做百万富翁。”这些纪实报告和小说活生生地表现了一些接收大员贪婪、丑恶的嘴脸。

国民党派到台湾的干部，不乏清廉有能力者，但以权谋私、贪污舞弊者更多。1946年，大大小小见报的贪污案件屡见不鲜，其中比较大的有：任省专卖局局长的任维钧，被人在《民报》上公开举出证据的贪污金额就高达500万旧台币，但依然逍遥法外。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在任纸业印刷公司经理时，把几部价值数千万旧台币的大机器廉价标卖，暗中又派代理人以极低的价格买入，李卓芝改调台北市专卖局长后，接任者发现此事，便向上级告发，但李卓芝仅被陈仪骂了一顿了事。省贸易局局长于文溪，被国民党中央清查团查出贪污事实后，虽移交法院审理，但“钱能通神”，清查团走后，于文溪不久即被从狱中放出。虽然于文溪最后被撤职，但在移交工作时，却不仅把日本人留下的清单销毁，而且把仓库里的存货编造名目私吞，如谎称食盐被人民抢去1万担，红土（高纯度鸦片土）被白蚂蚁吃掉70公斤，糖损失数十万斤。不用细想就知道这些纯属谎言，1万担盐需要多少人才能抢去？多少白蚂蚁才能吃掉70公斤鸦片？且白蚂蚁是否吞食鸦片？贪污盛行，造成台湾同胞对陈仪接管当局的失望与怨恨。

国民党接收台湾后，为了发动和扩大内战，开始对台湾进行大肆搜刮，造成岛内社会秩序混乱，物价飞涨，粮食奇缺，失业严重，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国民党到台后，将从日本人手中接收的237家企业、600多个单位的经营权，全部交给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所属的27家公司。另外，沿袭日据时代的专卖制度，国民党当局不仅将樟脑、火柴、烟、酒等物品全部纳入专卖，由官办的专卖局经销，还将盐、糖、石炭等许多民生物资也由专卖局之外的机构来统一承办，甚至连毛笔、文具、教科书等都由省教育处主办的台湾书店专卖，各机关团体若不从该店买文具书籍，会计处不予报销。此外，与专卖局互为表里的贸易局、运销局、燃料调剂委员会等官方机构垄断了全岛工业产品的购销与输出，举凡樟脑、米、糖、纸张、木材等重要物资，只有贸易局可以运销岛内外，进口贸易亦然，以致一些违法官商可以从中牟取暴利，受害、受剥削的乃是广大的老百姓，从而极大地激化了台湾民众与国民党政权的矛盾。

1947年7月，蒋介石开始发动全面内战，为征集军粮，台湾行政当局将本地大米输往大陆，加之奸商的囤积倒卖，导致盛产大米的台湾就闹起米荒。米荒最先始于台北市，然后逐渐波及北部各地，之后就是中、南部，一眨眼之间全岛各地都闹起米荒。到了11月底，第二期稻收成后，不但形势没有好转，反而更趋严重。1937年以前，台湾的大米每斤为0.11元，抗战期间为0.16元（配给价格），但国民党接管台湾后，由于实行掠夺性的“田赋征实”政策及将大批大米运往大陆，致使粮价急剧上涨，到1947年1月，大米1斤涨至13.4元，到2月20日竟涨至40元。国民党接收台湾仅1年4个月，粮食价格上涨250倍，因无米可炊全家自杀之事常有发生。对于台湾米荒的状况，战后初期被派遣驻台记者王思翔，于1951年12月在上海出版的《台湾二月革命记》中这样写道：“台湾本来是谷仓，1946年的年产量超过89万吨，供本省人口粮尚有余，但因军用米占了很大的比率，所以今春的米价反而比上海还高，甚至发生饥馑现象。苛敛诛求的结果，加速了农村的破产。被饥饿所迫的人们，年轻的成为小偷强盗，女人当了娼妓，光是盗窃就使牢狱超额，收容人数超过平常的三四倍。”

据统计，1946年，台湾两季稻收成共640万日石，台湾本省所需食米为500万日石左右，剩余的足可以应付任何意外或灾患。出于内战的需要，国民党政府把从台湾征收的大米和用肥料从农民手中换来的大米，全部运往苏北和华北充军粮了，这才是造成台湾2月中旬米价再次暴涨危及人民生存的根本原因。由于米价暴涨，大闹米荒，台北出现了一个“反对抬高米价行动团”，在“二·二八事件”的前二周（2月13日），台北市千余人聚集于华龙山寺口，整队出发游行请愿，要求解决米荒问题。

受大陆通货膨胀的影响，台湾也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陈仪接管台湾后，虽然采取特殊政策，继续使用原有旧台币，让它和大陆币制隔离，以避免受大陆经济混乱的影响。然而实际上，台湾无法断绝与大陆间的经济关系。战前台湾银行发行钞票约8000万元，1945年8月抗战结束时，台湾银行总发行额为14.3亿元。陈仪来台两个月后，发行额剧增至20.8亿元，1946年5月增至29.4亿余元，1946年底增至53.3亿余元，也即台湾银行的发行额，自1946年6月至同年年底增加1.8倍。随着纸币天文数字般的泛滥，物价当然也就猛涨起来。台北市50种商品的批发物价指数，1946年比1945年增加260%，1947年又比1946年增加360%。台北市一斤白米的价钱由1945年8月的二毛钱涨到同年11月的12元，再涨到1946年2月的16.8元，再涨为1947年1月的80元！另

外，由于当时台币与法币采取的是固定汇率，即1元台币兑30元法币，于是贪官污吏、不法奸商和黑社会分子，便从各种渠道将法币兑成台币，在台套购物资，运回大陆高价售出，使台湾的物资更加匮乏。

百业萧条伴随的是失业人口增加。由于台湾行政当局的经济管制，剥夺了民间企业的经商自由，加之官吏昏聩无能、贪污舞弊，致使大批官营企业或民营企业破产、关门，直接导致了经济形势的恶化。到1946年底，台湾官营、民营工厂已有90%停工，造成大批工人失业。据1946年统计，台湾失业劳动者已达80万人，占全岛人口的10%以上。另外，1946年以后，约有数十万的留日学生、退伍军人、军属陆续返台，使得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失业人口的激增，使社会治安迅速恶化，被生活所逼而沦为盗贼者日益增多，“二·二八事件”爆发前夕，仅台北市大同区一个星期之内就发生了十多起盗窃案。

物资的缺乏，尤其是米粮的短缺，本已造成民生痛苦与社会不安。然而，国民党当局还漫天要价地向台湾同胞征税，更使人民群众怨声载道。1947年2月中旬，由于粮食缺乏，各地发生了“抢粮暴动”。同时，岛上街头巷尾还出现了嘲笑国民党政权的漫画及宣传。群众集体反抗事件越来越多，如1946年上半年发生在高雄市郊区湾仔区内的农民集体抗租事件；1946年10月台湾钢铁公司、高雄制碱厂、高雄水泥厂、台北烟草公司、汽车司机等各地频频发生劳工“反对解雇”的示威罢工；甚至连公务员也为要求改善待遇、反对政府拖欠薪金而进行罢工或游行、请愿；学生们则进行罢课，学生的领导者甚至主张用实力来解决问题。

整个台湾，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已在各地频频发生的民众反抗的事件或冲突，累积的结果就是全岛奋起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二·二八事件”。

## ◎ “二·二八事件” 爆发

台湾回归祖国才一年多的时间，台湾同胞的心情已从光复之初欢天喜地的热望变成呼天唤地的失望，甚至濒临绝望，台湾同胞所累积下来的对国民党腐败政权的愤怒正在寻找机会发泄。

1947年2月27日黄昏，国民党专卖局查缉私烟的查缉员傅学通、叶根德

等6人在台北市延平路一带抄查私烟时，查获一名40岁的寡妇林江迈正在出售私烟，便将林妇的香烟和现款悉数没收。林妇便以生活困难跪地苦苦哀求，但傅学通等人不但不答应，还以手枪枪柄敲击林妇的头部，以致林妇头破血流，当场昏倒。围观的路人看到这种残暴行为，愤慨地一拥而上，把查缉员团团围住，喊打之声四起。被群情激愤的群众所包围的查缉员一看情况不妙，拔腿就逃，群众则紧追不舍。为逃离群众的包围圈，查缉员便开枪乱射，一个在楼下观看的市民陈文溪被射中，当场死亡，傅学通等则乘群众慌乱之机逃进警察分局。群众看到无辜的市民被射杀，群情更加激愤，蜂拥至警察分局，要求交出杀人凶手以正法，警察却说已把犯人交给宪兵队，民众又赶到宪兵队，宪兵队却说根本没有这个犯人。愤怒的民众又回到现场，将查缉员遗留下来的卡车，连同车上缉获的香烟，全部放火烧掉。

民众的愤怒并没有就此平息。2月28日清晨，愤怒的群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惩罚杀人凶手”。沿途的民众陆续加入，使整个游行队伍达到数万人之多。他们高喊“打倒陈仪”、“打倒贸易局”、“实施台湾高度自治”等口号，并沿街敲锣打鼓通告罢市。全市商行立即响应，全部关门闭户，学生则全部自动罢课。渐渐地，群众的愤怒情绪已无法控制，游行示威转化为暴力行动。他们行至太平町一派派出所前，该所警长黄某欲上前加以制止，受阻而激愤的民众便将其围住痛打，并冲入派出所内，捣毁所有物品。之后，游行队伍又向专卖局台北分局挺进，冲进局内打死该局职员2名，伤4名，并将局内的香烟、酒、家具、现钞，甚至汽车、自行车等都搬到街道上当众焚毁，一时火光冲天，整整一天都没有熄灭。下午，游行队伍又转赴长官公署陈情请愿。由于长官公署四周已经布置了大批武装部队阻止民众接近，激昂的民众不顾哨警的制止就冲了进去。突然公署楼上有机枪向民众扫射，瞬间6名民众倒地，其中4人丧生，2人重伤，人群便迅速躲闪。但不到一个小时，分散的人群突然疯狂起来，许多激愤的民众对身穿中山装的贪官污吏追打，焚烧他们的汽车，其中为数不少的外省籍公务员被殴打，真正的暴动由此开始。

28日下午3时，激愤的民众聚集在台北“新公园”，召开“民众大会”决议彻底抗争。随即，民众占据公园内的广播电台，播送台北缉烟血案的经过，号召全岛人民一齐奋起反抗。这一消息又经铁路站或邮电局的电话，一站一站，一局一局地传下去。3月1日起，事件迅速扩及中南部，两三天内，各地响应台北的行动纷纷出现，全岛各大城市及部分乡镇皆发生骚动，各地

愤怒不平的民众攻击官署警局，殴打大陆人，发泄一年多来对国民党政权的怨愤之气。国民党军警人员开枪镇压，各地死伤的消息频频传出。

3月1日，事件的消息传到嘉义市。下午3时，由台中南下的三辆卡车载来一批青年，在嘉义市中心向聚集的群众报告事件的经过，并呼吁嘉义市民响应抗争行动。市民立即响应，各自编制队伍，以木棍、竹剑等当武器，分头袭击市长官舍与政府机关，殴打官吏，烧毁财物。接着袭击警察局并扣押局内枪械子弹。3月3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嘉义分团与嘉义市参议会联合举办市民大会，成立“嘉义防卫部”，这是当时全岛最大规模的民众作战部队。下午，嘉义“民众部队”攻击第19军军械库，并控制嘉义广播电台，晚上又攻陷了嘉义市政府。3月4日，“民众部队”约3000人大举攻击国民党军营及政府官员聚集的嘉义中学，经过一番激战，军营被攻陷。国民党军分两路逃走，一队逃向兵器库，另一队则进入嘉义水上飞机场内。“民众部队”追击败走的国民党军，围攻兵器库，经过一番激烈战斗，国民党军队投降。但国民党军队在投降前把兵器库炸毁，因而“民众部队”未能获得预期的大量武器。3月5日，嘉义的民兵与来援的台中队、斗六队、新营队等联合，合力向水上机场发动总攻击，占领水源地及发电厂，切断通往机场的水电。国民党军队觉得形势愈趋不利乃提议停战，并提出市民应将所携武器全部集中于警察局，向飞机场提供食物等条件，“民众部队”未加细想便答应停战。然而，这只不过是国民党军队的缓兵之计，到了下午，突然出现来自台北的飞机数架，投下大量武器、弹药、粮食等，国民党军队获得补给后，立刻发动反攻，遭遇突然袭击的“民众部队”，死伤300余人而败退，国民党军乃乘胜攻入嘉义市内。于是，两军就在嘉义市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市街战，双方僵持了5天。由于从台中南下的援军及时赶到，“民众部队”又把国民党军赶回飞机场。在“二·二八事件”中，嘉义地区可以说是冲突最严重、战况最激烈的地区。

除几个大城市之外，新竹、屏东、宜兰、花莲、台东等地也发生了武装暴动，市民攻击警察局、驻军、官舍，抢夺武器的事件层出不穷。

以上各地起义、暴动，性质并不一致。有些地方确是武装反抗，如嘉义的“民众防卫部”、台中的“二七部队”，高雄的青年学生兵，但有的地方却只是民众自行维持地方治安。在各地的行动中，参与的民众也相当复杂，包括青年学生、失业者、地方领袖，但也有地方流氓混迹其中。

由于不了解祖国大陆的情况，很多台湾同胞不可能把陈仪政权中的贪

官污吏和自大陆来台工作的中下层职员区分开来，广大台湾同胞和国民党政权的阶级矛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度转化为“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省籍矛盾。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中，各地部分愤怒的民众看到外省人就殴打，使许多无辜的外省籍平民百姓遭到池鱼之殃，结果是原先作为反抗对象的高官丝毫无损，遭殃的反而是小公务员、商人、妇孺。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台湾人，在动乱中保护大陆人，或救助受伤的大陆人，也有不少“外省人”同胞认识到这是一场“打错了”的悲剧。

据研究，在事件中痛打外省人的，多数是台湾本地的流氓和从海南被日军征召入伍而在战后失业的士兵。至于广大善良的台湾同胞却是保护“外省人”的。老记者王康年追忆当年他从馆前街一家旅社楼上窗口，“看到满街打外省人的景象，既气愤又伤心，我想不到台湾同胞竟如此残忍。冤有头，债有主，长官公署开枪杀人，你们去打长官公署好了，为什么找无辜的外省人出气？”欧阳予倩指出，“事件是积愤触发的，排斥外省人，不过是一个小插曲”。

为了平息民众的愤怒，解决各地民众的暴动，3月1日，台北市参议会邀请“国大代表”、“国民参政员”及省议员等组织“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并建议行政长官陈仪筹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由省内各参议员、“国大代表”以及商会、工会、学生、民众、政治建设协会等五方选出的代表组成。3月3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会中商定军队撤回军营，地方治安由宪警和学生青年组织治安服务队维持。随后，全省各地以县市参议会为主体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地方分会相继成立，竞相开会，并提出事件处置的对策与政治改革的要求。

“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也逐渐由一个原本皆在平息事件、料理善后的临时组织，发展成一个开展政治改革运动的团体。3月5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正式通过组织大纲，提出“改革台湾省政治”的宗旨；3月6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更指出，“二·二八事件”的发生“目标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3月7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改革方案四十二条”（后精简为32条），包括要求省自治、保障人民各项基本权利、撤销贸易局和专卖制度、废除苛捐杂税，接收日产由省政府自行处理等多项内容。行政长官陈仪一方面对“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意见和改革纲领虚与委蛇，另一方面则电请蒋介石派遣整编21师的一个加强团来台“镇压叛乱”。3月8日中



午，宪兵队第四团团团长张慕陶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进行谈话，除肯定政治改革目标，呼吁勿牵涉军队之事以刺激中央外，并以生命担保中央决不调兵，“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当天就发表取消这“三十二条”的声明。然而，蒋介石派往台湾的21师已经出发，而这“三十二条”也就成为“反抗中央背叛国家阴谋”的罪证。

## ◎血腥镇压悲剧

南京政府接到陈仪有关“二·二八事件”的报告后，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其他高层官员，都认为要以叛乱案处理，派出军队坚决镇压。

3月8日下午，就在张慕陶向“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保证中央绝不调兵的一小时后，国民党的增援部队第21师抵达基隆，接着从福州运来的宪兵第四团两个大队也登陆基隆港。同时，21师的另外3000名士兵则在高雄登陆。这些援军登陆后，便开始进行血腥镇压，状况十分惨烈。根据基隆市一名职员供述，在他亲自看到或听到的范围内，市警察局在要塞司令部的指挥下，抛入海中的市民达2000人；凡是被发现有日据时代的任何徽章、帽子、旗帜及防空演习用的臂章，其家中的男人一概被抓。一位基隆市民事后讲述：“登陆的士兵对着码头工人与苦力，未加任何警告就突然用机枪扫射，瞬时有数十名、数百名工人应声倒下，悲鸣与哀号声四起。市民见状便乱奔乱窜，慢一步的就可能成为枪口的猎物，死伤者到处皆是。我的人生观与中国观一下子颠倒过来。”

3月8日当天，陈仪一听到援军登陆基隆后，立即下令解散“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并颁布戒严令，开始由武装的特务、宪兵、警察抓捕“叛乱分子”。在铁路管理委员会执行任务的30多名青年学生则全体被捕，有的被刺刀刺死，有的被从楼上推出窗外。一位法官是这样讲述的：“陈仪于8日下午，先派了一个大队包围中山堂，其中的一中队冲进中山堂内，将各楼各室正在处理各部门事务的学生、青年共200名，乱杀一阵。9日至13日之间，足足四夜，到处都有军队在开枪。马路上，小巷内，铁路边，到处是死尸。”对于国民党援军的滥杀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对华白皮书》中是这样记述的：“3月9日起，在美国领事馆的宿舍前面，工人并未有任何挑